

分析报告 • 比较研究

柯蒂斯·亚尔文的新官房主义 对比开放式规划

两种未来的数字模式

作为私人公司的国家——与作为向公民负责的开放式计划体系的国家

分析平台 [gosplan2.ru](#)

主题：数字治理、新反动主义、后资本主义

2026

目录

1. 导论：对同一诊断的两种回答
2. 柯蒂斯·亚尔文的新官房主义：模式构造
3. 开放式规划2.0：模式构造
4. 两种体系的主要差异（汇总表）
5. 两种模式分道扬镳的三个岔口
3. 关键的意识形态矛盾
7. 两者的共同点，以及为何必须划清界限
3. 结论
3. 资料来源与方法论说明

1. 导论：对同一诊断的两种回答

柯蒂斯·亚尔文的新官房主义与开放式规划体系（“国家计划2.0”）代表了在国家治理中运用技术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。然而二者的出发点是同一个诊断：传统国家治理不善——迟缓、不透明、激励扭曲，且对结果没有真正的问责。

两者都主张以技术、可衡量的指标以及报酬与结果的刚性挂钩来重建治理。但此后道路彻底分歧，因为二者对两个核心问题的回答不同：谁设定目标，以及成果归谁所有。

新官房主义是把国家变成私人公司的极右翼技术官僚专制；而开放式规划是计划与市场的左翼民主式数字综合，技术服务于社会，而非资本所有者。本报告考察两种构造，将其差异汇总成表，并说明为何二者之间的划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吹毛求疵，而是一项工程上的必要。

2. 柯蒂斯·亚尔文的新官房主义：模式构造

新官房主义是美国程序员、评论家柯蒂斯·亚尔文（笔名 Mencius Moldbug）提出的概念，他是“新反动主义”（NRx）思潮的创始人。核心文本是博客 *Unqualified Reservations*（2007 - 2013）以及“拼布”（Patchwork）构想：世界被划分为众多小型主权“国家—公司”。

这一名称指向官房学——17至18世纪专制国家的行政学，其中国库与国家被当作君主的家业来经营。亚尔文把这一逻辑移植到数字时代：国家成为gov-corp，即拥有领土的股份公司。

2.1. 核心要素

- 主权即财产。国家是私人财产。领土、土地和基础设施属于股东，而不属于“人民”。
- 由首席执行官治理。国家由董事会任免的CEO管理。没有分权、没有议会、没有普选——这些被视为低效率的来源。
- 居民即客户。居民是安全、治安与基础设施服务的消费者。关系由服务合同调整，而非由政治权利调整。
- 以“退出”取代“发声”。反馈机制不是投票，而是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竞争：不满的居民迁往另一个gov-corp，就像客户更换服务商。管理不善会以客户流失和资产价值下跌为惩罚。
- 公司效率是最高价值。治理按最大科技公司的模板构建：刚性垂直体系、KPI、监控，以及为推高股价而进行的成本优化。

2.2. 内在逻辑

亚尔文的论证是：民主在主权层面造成了“搭便车问题”——没有人拥有国家，因此没有人有动力提升它的长期价值。一旦国家有了真正的所有者，其私人利益就会与良好治理相一致：股东不会毁掉自己拥有的资产。

这一逻辑的弱点显而易见：所有者的利益与居民的利益并无任何保证会重合。所有者追求资产价值最大化，而非其领土上人民的福祉；凡是利润以牺牲居民为代价获取之处，这两者就会分离。该模式留下的唯一防线是离开的权利；但离开的权利并不是施加影响的权利，而且对大多数人而言在经济上遥不可及。

3. 开放式规划2.0：模式构造

开放式规划体系从关于治理不善的同一观察出发，却由此得出相反的构造。核心思想是将计划的战略目标（框架、优先事项、限额）与“实地”的市场协调结合起来——通过资源与承包的链上市场，使资源的一切流动公开且可验证。

3.1. 核心要素

- 民主的目标设定。目标、限额和优先事项由公民层级按“一人一票”原则确定（公民大会、投票、防止投票权集中），而不是由按代币权重计票的DAO确定——后者将是财阀统治。
- 基本资源的公有制。基础设施、土地、数据和关键平台保持集体所有；由此产生的租金不被私有化。
- 公民是共同所有者与监督者。预算、KPI、订单状态与验收标准均为公开：公民无需申请、也不受“商业秘密”阻挡，即可看到资源流向。
- 技术官僚只是执行层。专家负责测算平衡、设计机制并实施计划，但不设定计划的目标。这是整个模式的关键约束。
- 计划与市场的混合。中心设定框架，具体配置则由配额拍卖与承包市场完成。这既消除了中心的信息过载，也避免了纯粹市场的无序。
- 盈余流向人的领域。常规工作自动化带来的收益被有意识地引向医疗、教育与照护，而不是为节省成本而削减就业。

3.2. 内在逻辑

该模式区分了技术官僚方案通常混为一谈的两个层次：目标设定与执行。技术（智能合约、预言机、遥测、人工智能）只属于第二层——它使执行变得可验证且迅速。第一层在构造上仍然是政治的、民主的。正是这一区分，保护了体系不至于变成亚尔文所描述的东西。

4. 两种体系的主要差异

标准	柯蒂斯·亚尔文的新官房主义	开放式规划体系 2.0
权力与目标设定	绝对专制。国家由首席执行官（CEO）管理。没有分权，也没有选举。	直接民主。目标与限额由公民按“一人一票”原则确定。
所有制形式	私有。国家是私人财产（gov-corp）。土地和资源属于股东。	公有。基本资源由全体公民集体所有。
公民地位	客户。居民是安全与秩序服务的消费者，没有投票权。	共同所有者与监督者。公民通过公共账本公开查看预算与KPI。
技术官僚的角色	全面的。技术官僚和高管自行决定国家走向何处、如何走。	仅为执行。专家只负责实施计划，而不设定计划的目标。
经济模式	公司垄断主义。按最大科技巨头的模板进行刚性的集中管理。	混合。中心设定战略框架，配额与承包在“实地”通过自由市场配置。
控制工具	封闭系统。为攫取最大利润而进行的公司监控与KPI考核。	公共区块链。智能合约、物联网遥测与公开的NFT工单确保透明。
合法性来源	产权：权力之所以合法，是因为领土被购买并归所有者所有。	公民授权：只要目标经投票通过且执行可验证，权力才合法。
反馈机制	“退出”：不满的居民只能迁往另一个gov-corp——更换服务提供商。	“发声”：公民投票、发起目标复议与审计，无需离开国家。
自动化盈余的去向	股东分红。自动化降低成本并增加所有者收入。	医疗、教育、照护。盈余用于劳动的人性化和增加人的岗位。

5. 两种模式分道扬镳的三个岔口

汇总表可以归结为三项抉择，其余一切都是它们的结果。

5.1. 谁设定目标

在亚尔文那里，目标设定的主体是**所有者**：首席执行官及其背后的股东。在开放式规划中则是公民，通过民主层级。关键在于：两种情形下的技术装置完全相同——同样的账本、同样的KPI、同样的优化算法。不同的只是由谁来指定目标函数。在没有明确**究竟优化什么以及为谁**的利益之前，“优化”是一项空洞的操作。

5.2. 基础设施归谁所有

在亚尔文那里归gov-corp的私人所有者；在开放式规划中归社会。这个答案决定了数字平台、数据与基础设施的租金归谁。数字系统具有强烈的网络效应并倾向于自然垄断：谁拥有协调平台，最终就获得了向其余所有人开列条件的能力。因此，基础设施的所有权问题不是经济效率问题，而是权力分配问题。

5.3. 透明朝向何方

这一差别最好用观察的方向来表述。在亚尔文的模式中，监控朝下：公司看见居民——他们的行为、支付与风险。在开放式规划中，透明朝上：公民看见预算、KPI、承包商与验收标准。技术上是同样的账本与遥测；政治上则是相反的构造。不指明方向的“透明”是一个空词：全面监视同样是一种透明。

6. 关键的意识形态矛盾

新官房主义——新封建主义

在亚尔文的模式中，自动化与数字化导向“新封建主义”：无权的大众依附于董事会的意志和算法的效率。技术并未缩小权力的不对称，反而将其固化：谁掌握资本，谁就掌握主权。在这样的体系中，劳动是一项理应削减的成本；人的价值恰好等于他对资产价值的贡献。

开放式规划——劳动的人性化

在开放式规划体系中，区块链与常规工作的自动化被用作劳动人性化的工具。数字化带来的盈余被有意识地投向医疗、教育和对人的照护，从而保护社会免受技术—行政阶级的支配。常规被自动化，人性因而得到解放；价值无法衡量的领域被有意识地排除在KPI的支配之外。

这一矛盾并不能归结为“恶意”与“善意”之别，而是源自目标函数的构造。如果体系优化的是资产价值，削减人的岗位就是理性之举；如果体系优化的是经社会批准的目标，同样的自动化收益就成为扩展人的岗位的资源。同一项技术收益，会因由谁指定标准而产生相反的社会后果。

7. 两者的共同点，以及为何必须划清界限

诚实的比较必须承认：两种模式有共同的基础，而这正是它们容易被混淆的原因。

- 两者都认为当今国家治理不善，并且治理可以被重新设计，而不只是“在边缘上修补”。

- 两者都认真对待可衡量的指标、对结果的问责以及数字化的核算工具。
- 两者都依赖本身在意识形态上中立的技术装置：智能合约既能服务股东，也同样能服务公民大会。
- 两者都批评现有制度的官僚式不透明与迟缓的反馈。

由此得出主要的实践结论：若没有民主的目标设定层与公有制，数字规划在技术上与gov-corp无法区分。透明、KPI与智能合约本身并不能保护任何东西——真正起保护作用的，是由谁掌控它们，以及目标函数是为谁的利益而设定的。

这与本平台另一板块所讨论的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得出的结论相同：数字规划的主要风险不是技术性的（可扩展性、预言机、交易成本），而是**政治性**的——目标设定被技术行政阶级俘获。就此而言，新官房主义作为一种**极限情形**颇具价值：它展示了当民主层被有意移除后，数字治理会变成什么。因此它不仅是批判的对象，也是对我们自身模式的一次压力测试。

8. 结论

新官房主义与开放式规划使用相似的技术工具，却得出相反的政治结果。差别不在算法，而在于由谁启动这些算法、为谁的利益服务。

因此在开放式规划模式中，民主的目标设定不是装饰性的附加，也不是修辞上的让步，而是承重结构。一旦移除它，得到的正是亚尔文所描述的东西：一套对所有者高效而透明、对公民却完全不可穿透的治理体系。

同一份智能合约，既可以是股东的工具，也可以是公民的工具。一切取决于一个问题：谁设定目标，成果归谁所有。

9. 资料来源与方法论说明

对亚尔文立场的阐述依据其公开文本，属于一种重构：新官房主义是一套评论性纲领，而非已实现的制度。因此，本比较是在两个方案之间进行的，而不是在两个运行中的制度之间进行的，具有分析性质。

1. Curtis Yarvin (Mencius Moldbug)：Unqualified Reservations, 2007–2013年系列文章，包括《A Formalist Manifesto》与《Patchwork: A Political System for the 21st Century》。
2. A. O. 赫希曼：《退出、发声与忠诚》，哈佛大学出版社，1970年——第4节所使用的“退出”与“发声”的经典区分框架。
3. Д. А. 达维多夫：《技术(统治)社会主义：对 B. 金和 R. 佩蒂思想的批判性审视》，《社会学研究》，2023年第9期。
4. gosplan2.ru 分析平台资料：《开放式规划系统》《对技术统治批判的回应》《弱点与风险》。

本报告为 gosplan2.ru 分析平台编写。完整比较见网站“柯蒂斯·亚尔文”板块。